

淺談語境規劃：由族人為主體進行土地分配

コンテキストによるプランニングについて：原住民を主体として行う土地の分配
On Indigenous Planning: Land Allocation Based on Indigenous Subjectivity

文・圖 | Watan Basaw (城鄉潮間帶專任規劃師與研究員)

氣候變遷與環境災害，讓我們重新思考人跟土地關係與其背後的殖民理論架構，規劃作為一種活動，原住民在殖民前已經持續世代，它將原住民知識、文化價值和社區需求融入土地和資源的管理和發展中，並透過口述持續適應當代需求，但這關係，從殖民時期開始被剝奪與被文明化 (Sandercock, 2004)，其世界觀在現代社會被正統的西方與漢人哲學思想背景隱藏，建立與殖民共謀的空間安排 (Walker、Jojola 和 Natcher, 2013)。規劃領域稱這地方性、集體性與持續性的本土活動為indigenous planning，代表我們的語言與身處的環境，用中文可直接

譯作「語境規劃」。首先簡述殖民前原本的秩序，接著簡述語境規劃的實踐。

原本的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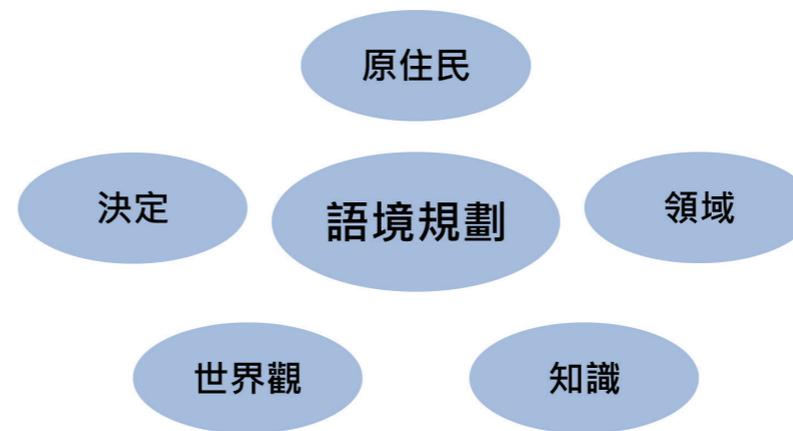
殖民前，原住民與環境、人類與各種靈的互動關係是根據其族群的口述知識、世界觀與價值的集體長期行動 (Jojola, 2008)，這些行動決定平衡、相互對稱與互惠的資源 (土地) 使用與分配，如在Boothroyd的研究中指出：「對北美原住民社區來說語境規劃總是發生在組織捕魚、狩獵、宴會和村莊的過程中」。這些傳統是在特定的、共同經驗的連續歷史中演變而來的 (Jojola, 1998)，運作基本上不受氏族 (kinship/clanship) 群體之外的力量所



泰雅社會規範。

影響，這套系統是實用、動態且持續地跟著當代需求改變。筆者博士論文也提出長期集體決定這些關係是否要新建、維持、修復與結束 (Liao, 2022)。

Moore 等人 (2007) 所提的七世代原則概念 (Seven generations, 基於古老的Haudenosaunee (易洛魁人Iroquois) 哲學)，考慮當今前後三代的計畫，量化這個七代時間並將我們這代置於



語境規劃過程。

140年循環時間的節點，相對於西方線性時間的中間點以及強調個人設計與短視的願景特質有截然不同的光景。循環時間可以參考以下敘述，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與空間的聯繫在不同世界觀也有不同的理解，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信仰中，時間是線性的 (Ross et al., 2011)，在這個信念中，時間可以按小時、天、月和年的順序來測量。對原住民廣義的來說，時間是「實踐時間」、「社交時間」、「宗教時間」、「夢想時間」等 (Janca and Bullen, 2003)，這些類別同時存在，相對於時間是過去、現在、未來，而在原住民世界觀比較像是地方週期性的。根據個人或其家庭或社區的重要性，將

事件和個人放置在這個循環時間中。這就可以解釋原住民可以跟各種靈對話，曾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祖先也是活躍成員 (Godwin 和 Weiner, 2006; Bradley, 2008)，然而，當代時間已經以時鐘和任務為導向，被束縛在資本生活中 (Pickering, 2004)，這種時間控制概念否認自然界中死人的存在，而將那些有能力測量時間的人視為進步。在泰雅語裡面也存在這些考慮過去與未來的思考，例如tuqi是道路的意思，加個前綴smtuqi就是開路引導，應用在與新環境創造關係的階段，kkblaq使更好完善的意思，在於維護原本的關係，使其符合當代的需要來滿足集體的共識。

原住民利用他們的知識、價值觀和原則來決定他們的位置 (無論是在建築環境還是自然環境中)，以定義和推進他們現在和未來的社會、文化、環境和經濟願望，這個活動牽涉到氏族、領域、知識、世界觀、決定等面向。



西方透過個人權利或所有權的新自由主義概念來理解土地，而原住民是透過「共同所有權和繼承的長期模式」 (Jojola, 2008, 43頁)，反映在空間上，借用Howitt的局限空間來解釋地理上的相互關係，生態系的邊緣往往具有巨大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其中「邊緣」不是分隔線，而是相互作用的區域，存在著轉變、跨越和可能性的區域，傳統領域的重疊區域，是不斷地互相新

建、維持、維護以及結束關係的空間規劃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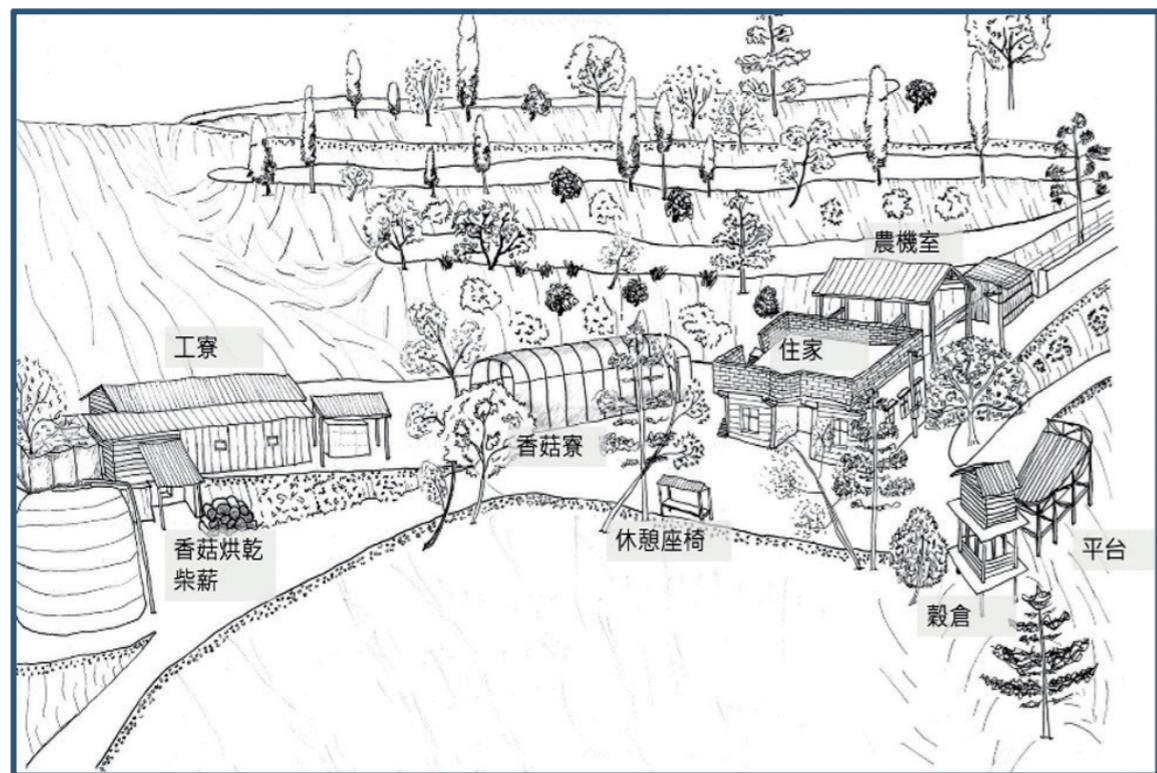
語境規劃實踐

Matunga (2013) 認為語境規劃是由原住民／與原住民一起進行（而不是為原住民規劃），利用（或至少充分認識）他們的過程來實現其確定的結果。此規劃目標須考慮社會凝聚力和福祉、文化保護和增強、環境品質和數量、經濟成長和再分配、政治自治和倡導

(Matunga, 2017)，因此他定義語境規劃：「原住民利用他們的知識（和其他知識）、價值觀和原則來決定他們的位置（無論是在建築環境還是自然環境中），以定義和推進他們現在和未來的社會、文化、環境和經濟願望」，這個活動牽涉到氏族、領域、知識、世界觀、決定等面向。

氏族就是動員社區的基本單位，將聚落、流域等空間與社會關係聯繫在一起，

是西方規劃中社區與區域規劃的原型 (Jojola, 1998)。領域依據不同事件與目標的範圍（部落、流域、攻守同盟等）建立的規劃原則，也可以推演到殖民前的迫害。利用生活環境知識來做空間分析，並非尋求「不懈地關注未來」（Collard、Dempsey 和 Sundberg, 2015），而是正向思考過去，傳統知識更多的是關於「生活方式」（Nadasdy, 2003），這些生活方式、地



鎮西堡土地使用關係圖。

最後規劃實踐過程可能有不同的認識，大部分聚落還是在自己傳統的實踐方法與當代的束縛中努力找尋平衡，例如原民會只認同部落會議的內涵，國家最高法院對狩獵行為的認定與部落的落差，因此語境規劃是達成自決的工具。



點與時間是相互關聯的 (Gombay, 2012)，這種密不可分的關係創造了情境知識。這與私有財產間轉讓關係不同，需要人類、環境與各種靈之間的持續合作 (Raffles, 2002)。這種關係創造了「共同的存在和相互依存的未來」(Watene and Yap, 2015) 和「不同種類的相互義務」(Mika, 2015)，這是基於科學的方法沒有認識到的聯繫 (Suchet, 2002; Ross et al, 2011)。

用世界觀來指導地方的蓬勃發展，類似當代適應潮流的國土計畫空間指導原則，如近年氣候變遷的議題以及韌性發展概念的引入，例如在北泰雅特定空間計畫案中鎮西堡居民，經過不斷地集體活動，同意將一塊土地使用從耕地變成林地，根植於其傳統語言中對此地有崩地的時間與事件敘述。另外在司馬庫斯的訪談與規劃過程，也發現其運用當代蜂窩的社會組織來針對土地集體使用、分區與彈性使用的管例，並在近代訂下限制遊客總量的決定，但反過來說傳統語言中可使用的土地，在國家霸權劃分下可能會因為城市的發展需要變成各種敏感區，如生態與水資源等，這過程存在結構上的歧視。這些指導原則透過原住民自己認可的社會結構與組織及流程來做決定，當前的村里長、社區發展協會、其他協會、地方民意代表、部

落會議主席、民族議會與青年會等等眾多組織，這些與傳統幹部間需要時間與共同想改變的意願，才能達到共同認可的階段。這傳統的決策內涵可能包括但不限於目標群體（階層或氏族組織）、傳統價值、傳統知識、領導特質、長者、互惠與真實參與關係，如筆者在台東知本卡大地田野期間，參與其部落會議，每個年齡層都可以在會議中發言，決策者也會將問題安排在會議議程中討論，並且是持續性地針對問題的處理過程與結果做討論。最後規劃實踐過程可能有不同的認識，大部分聚落還是在自己傳統的實踐方法與當代的束縛中努力找尋平衡，例如原民會只認同部落會議的內涵，國家最高法院對狩獵行為的認定與部落的落差，因此語境規劃是達成自決的工具 (Hibbard, 2022)。



Watan Basaw

賽德克族 (Seediq Truku)，南投縣埔里鎮人，1984年生。英國伯明翰大學地理博士。現為城鄉潮間帶專任規劃師與研究員。從2012年，在台大城鄉基金會宜蘭工作室擔任規劃師開始，走訪宜蘭各部落、新竹司馬庫斯與鎮西堡，到近年台中和平區泰雅聚落整體規劃案，專注於土地發展與原鄉地區的關係。